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5.015

# 后扶贫时代影响搬迁妇女生活满意度的心理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李科生<sup>1,2</sup>, 韩莹莹<sup>1</sup>, 黄娇娇<sup>2</sup>

(1.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1; 2.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基于贵州省多个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妇女的问卷调查数据, 构建多重中介结构方程模型, 研究发现: 压力知觉显著负向影响搬迁妇女的生活满意度; 领悟社会支持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社交回避以及苦恼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交回避以及苦恼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启示: 通过强化安置社区政策宣传和提高服务水平来提升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并控制好社交回避与苦恼等焦虑情绪, 可以有效减轻压力知觉对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妇女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后扶贫时代; 搬迁妇女; 压力知觉; 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2)05-0125-0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的发布标志我国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 而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5年的努力,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 农村贫困人口占比由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9年的0.6%<sup>①</sup>。2021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查缺补漏, 巩固脱贫成效”的后扶贫时代。在此背景下, 如何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工作, 不仅关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 更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实现。

对于搬迁移民而言, 身份的改变会使其个体面临归属感缺失危机<sup>②</sup>, 其不仅要面临收入、工作等物质因素的压力, 也会受到人际关系重构、居住环境改变等社会因素的困扰, 特别是当国家帮扶

政策无法有效贯彻执行时, 搬迁移民在安置社区的心理满意度会随之下降<sup>③</sup>。然而, 当前不少地方政府过度重视经济收入和数字脱贫等“硬指标”, 而忽视内生动力和生活质量等“软指标”, 这必然会影响搬迁移民“安居”后的“乐业”, 尤其是作为家庭核心成员的妇女, 其压力知觉能力将直接影响搬迁后的家庭幸福指数<sup>④</sup>。基于此,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压力知觉是否会影响搬迁妇女的生活满意度? 其内在作用机理是什么?

##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文献回顾

生活满意度是指期望水平和实际感知之间的差距, 通常差距越小, 满意度越高<sup>⑤</sup>。搬迁政策实施后的“身体离场”, 导致搬迁移民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脱离、社交关系割裂, 致使搬迁移民的生

收稿日期: 2022-01-12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GZYB111)

作者简介: 李科生(1982—), 男, 湖南涟源人, 副教授, 博士生, 主要从事行为公共管理研究。

①方晓丹:《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 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_1724700.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_1724700.html)。

②丁波:《新主体陌生人社区: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 《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

③李斌, 李辉:《我国农村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现状、热点及展望》,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④时鹏, 任洪浩, 余劲:《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主观幸福感模糊评价——基于1250个搬迁农户的实证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⑤曾维莲, 杨文凤, 孙自保:《贫困人口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满意度评价——以西藏易地扶贫搬迁为例》, 《科技导报》2020年第13期。

活质量没有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sup>①</sup>。既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搬迁移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一是经济收入对搬迁移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Clark 和 Tella 等指出经济收入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指标<sup>②③</sup>;罗楚亮和陈云等人同样发现经济收入的增加程度以及生活水平的相对优越程度(与周围群体比较)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sup>④⑤</sup>。实践层面,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通过发展特色产业等方式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青海民族地区通过“文化+旅游”方式给搬迁移民提供新型就业岗位,以此提升贫困地区搬迁移民的生活满意度。因此,生活富裕程度成为搬迁移民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sup>⑥</sup>。二是公共服务对搬迁移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对搬迁移民而言,政府提供的各项补贴政策(医疗保障和入学减免等政策)已成为提升生活满意度的助推因素<sup>⑦</sup>。刘裕等人发现搬迁移民对政策认知以及参与的深度,是评判扶贫政策满意度的重要指标<sup>⑧</sup>。由此可见,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精细程度,应该成为群众对实施效果满意度的评价指标<sup>⑨</sup>,而当前学术界较少考察政策实施后的群众满意水平。三是心理因素对搬迁移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彭聘龄认为内心的体验才是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指标<sup>⑩</sup>。曾维莲等发现搬迁移民在安置社区的生活中,公平感、受益感、归属感等外在因素和孤独感、身份认同度等内在因素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指标<sup>⑪</sup>。当前政府往往过分关注搬迁移民“可量化”“可考核”的人居环境指标,而忽视其在

安置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再造问题。袁玥等进一步发现当个体感知到身心处于劣势时,会出现幸福感不足的困扰<sup>⑫</sup>。而当前学术界较少关注搬迁移民的自主压力体验,恰恰是这种压力感知的不足,将不利于搬迁移民生活满意度的提升。特别是当扶贫政策无法满足搬迁移民的心理诉求时,其对安置社区的满意度会骤然下降。

现有文献为我们研究搬迁妇女生活满意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对话锚点,但仍然存在值得拓展的研究空间:一是易地搬迁政策的目的在于启迪搬迁移民主动通过自身努力,打造新人际空间、新技能水平、新身份认同等能力<sup>⑬</sup>。而不少移民群众对国家扶贫政策仍抱有“等、靠、要”的被动心态。因此,需要重新审视搬迁妇女对扶贫政策的态度。二是社会因素的重构是搬迁妇女内生生活满意度提升的诱发因素。而已有研究更多关注收入、住房等硬性因素,较少涉及心理需要、认知等柔性因素。因此,需要将搬迁妇女的心理诉求纳入安置社区的文化建设中来。三是“稳不住”和“难致富”问题已经成为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的难点之一。而当前政府单一的行政逻辑会导致政策忽视搬迁移民生活质量的系统性提升,尤其是导致人际社会和身份认同的再造着力不够<sup>⑭</sup>。因此,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的再造,促进扶贫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立足于调查数据,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探究后扶贫时代搬迁妇女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以期增长新的知识点,为实践起到理论

①张磊,伏绍宏:《移民再嵌入与后扶贫时代搬迁社区治理》,《农村经济》2021年第9期。

②Clark A, Frijters P, Shields M A.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1):95-144.

③Tella R D, New H D, Macculloch R. “Happiness Adaptation to Income and to Status in an Individual Pane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10, 76(3):834-852.

④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⑤陈云,周昊:《北京市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研究》,《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2期。

⑥常晓鸣:《产业发展、就业质量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田野调查》,《民族学刊》2021年第4期。

⑦肖芬,殷颂葵,费胜章:《“稳得住”:移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青海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调查》,《特区经济》2022年第1期。

⑧刘裕,王璇:《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精准扶贫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经济问题》2018年第8期。

⑨赵德成,赵翔宇,谷香香,等:《基于农户满意度对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问题及改进路径研究——以河北省康保县为例》,《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4期。

⑩彭聘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4—55页。

⑪曾维莲,杨文凤,孙自保:《贫困人口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满意度评价——以西藏易地扶贫搬迁为例》,《科技导报》2020年第13期。

⑫袁玥,李树茁,悦中山:《参照群体、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基于广州调查的实证分析》,《人口学刊》2021年第5期。

⑬李宝凤,王洪娟:《宁夏生态移民心理满意度调查——以五堆子移民村为例》,《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⑭王寓凡,江立华:《“后扶贫时代”农村贫困人口的市民化——易地扶贫搬迁中政企协作的空间再造》,《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指导作用。

## (二) 研究假设

压力知觉是指个体通过感知性评估,为应激事件赋予一定意义,进而感知应激事件是否对自身造成压力<sup>①</sup>。搬迁后,相较于乡村生活,较为复杂的城镇生活环境使搬迁妇女体会到了社交活动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逐渐成为一种心理上的风险压力<sup>②</sup>。而与风险压力相对应的是搬迁妇女生活满意度。Liang 等人指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估<sup>③</sup>。Hamarat 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越大,其生活满意度水平越低<sup>④</sup>。搬迁妇女在陌生环境中缺少情感表达的对象和机会,同时在新的环境中无法找到应有的归属感<sup>⑤</sup>。当搬迁妇女面临工作或生活上的压力时,容易产生对生活质量的负性评估,进而负向影响其生活满意度。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搬迁妇女的压力知觉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

在探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认知机制时,学者发现社会支持、工作倦怠等外部因素发挥着中介作用<sup>⑥⑦</sup>。以往研究虽然探讨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因素,但鲜有研究从个体主观体验的视角来考察领悟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能够感知来自家庭、朋

友和其他人的支持,被认为是压力应对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重要认知因素<sup>⑧</sup>,是个体社会支持水平的关键指标<sup>⑨</sup>。史梦薇等人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生活压力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下降有关,生活共同体的破坏易导致情感链的“断裂”<sup>⑩</sup>,使个体难以感知到来自社会的支持。此外,Wang 等人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女性(如:医生、教师)拥有越高的幸福感<sup>⑪</sup>。尤其是对心思较为细腻的女性来说,领悟社会支持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领悟社会支持在搬迁妇女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社交回避及苦恼是影响搬迁妇女社区融入度及归属感的重要情感因素,是在社交情形中的一种持续且显著的焦虑症状,常用于评估个体的社交焦虑程度<sup>⑫</sup>,也是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社交苦恼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情境中的负向情感,包括紧张及焦虑等情感<sup>⑬</sup>。依照资源保存理论,高压力水平会导致个体投入到社交活动的资源减少,并加剧个体的苦恼<sup>⑭</sup>。搬迁妇女入住安置社区后,陌生的环境使她们难以找到倾诉对象,出现压力知觉水平增高的状况。尤其是出现与邻里沟通不畅的状况时,处于高压力

①Yildirim H S, Terzioglu F. “Nursing Students’ Perceived Stress: Interaction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lf-leadership”, *Perspectives in Psychiatric Care*, 2021, 58(1):1-7.

②刘升:《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③Liang D, Xu D, Xia L & Ma X.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vestigating the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Affect Balance”,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20, 48(5):1651-1659.

④Hamarat E, Thompson D, Zabrucky KM & Steele D. “Perceived Stress and Coping Resource Availability as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You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2001, 27(2):181-196.

⑤张会萍,石铭婷:《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基于宁夏“十三五”不同安置方式的女性移民调查》,《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⑥朱卫华,蒋丽丽,宛红娥,等:《消化性溃疡患者觉察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调节效应》,《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年第12期。

⑦王明辉,陈萍,李苏蓉,等:《监狱警察心理脱离在工作倦怠与生活满意度中的调节作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7年第4期。

⑧Leonard K S., Evans M B, Downs D S. “Postpartum Perceived Stress Explain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omen’s Health Issues*, 2020, 30(4):231-239.

⑨Haber M G, Cohen J L, Lucas 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Reported Received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 Meta-analyt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7, 39(1):133-144.

⑩史梦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研究——基于云南移民点的调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⑪Wang L, Wang H, Shao S, Jia G, Xiang J. “Job Burnou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Female Docto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11):435.

⑫Zhao S, Ye J. “Effects of Feelings of Inadequacy on Life Events,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Among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9, 8(1):19-26.

⑬王艳芝:《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与领悟社会支持状况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7年第3期。

⑭Shih Y C, Katelin B, Charles R. “Helping Coworkers Only When I Have More? Integrating Social Comparison, At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ies”,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2021, 44(7):1012-1028.

知觉水平的搬迁妇女更易产生社交排斥心理<sup>①</sup>。社交回避是一种回避社交的行为倾向,是个体遇到困难时的一种应激保护反应<sup>②</sup>。Tsai 等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认知行为回避,并导致社交能力下降<sup>③</sup>。对缺乏城镇生活经验的搬迁妇女而言,日常生活中遇到沟通不畅或被“歧视”现象时,此类回避反应尤为明显。回避倾向的泛化,会让其更加难以融入城镇生活,进而降低生活满意度。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社交回避及苦恼在搬迁妇女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结合认知、情感两方面,分别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建立多重中介结构方程模型,以探讨搬迁妇女的压力知觉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理。

##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一) 研究模型

本研究需通过多个中介变量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机理,因此需使用多重中介(Multiple Mediation)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研究假设,两个中介变量(M和W)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故采用单步多重中介模型考察搬迁妇女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设计多重中介模型路径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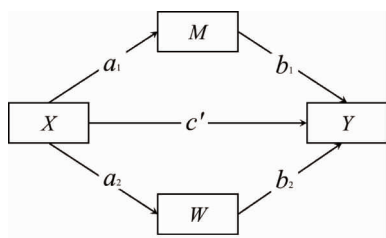


图1 单步多重中介模型路径

本研究采用单步多重中介检验方式,具体而言,路径图中自变量X代表压力知觉,中介变量M代表领悟社会支持,中介变量W代表社交回避及苦恼,因变量Y代表生活满意度。其中, $M = a_1X + e_1$ ,  $W = a_2X + e_2$ ,  $Y = c'X + b_1M + b_2W + e_3$ 。

温忠麟等人指出,对多重中介模型的分析通常需要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且Bootstrap法是检验多重中介模型效应的首选方法。Bootstrap方法是指以研究样本作为抽样总体(一般取样1 000—5 000次)并采用放回取样,其实是模拟了从研究样本中反复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通过对每次抽样得到的参数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的估计结果<sup>④</sup>。并且强调如果研究对象的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这类抽样分布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整体用于研究结果的参数估计。因此,在确定分析模型为单步多重中介模型后,采用Bootstrap法抽取5 000次样本进行模型参数估计,以得到更为合理的结果。

### (二) 数据资源来源

对研究调查对象的样本分析,可以更好地考察研究的统计效应量,因此使用统计效应量分析软件SPSS21.0对所需最低样本量进行分析。根据以往研究结果,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的平均分为(18.45±5.17)分<sup>⑤</sup>,我们将此大样本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的总体分数,即总体标准差 $\sigma$ 为5.17分,使用公式 $n = \left(\frac{u_\alpha \sigma}{\delta}\right)^2$ 进行样本量估算,其中n为所需样本量。进一步规定置信度 $\beta$ 为0.95(即参数测量值的可信程度范围为95%),则显著性水平 $\alpha$ 为0.05,同时设定结果容错误差 $\delta$ 为0.6。计算后估算出原始样本量n为556人。同时考虑无效作答的情况,设定对象的应答率为95%(即设定有5%的无效问卷)。最终计算得出需要的样本数为585人,即本研究需要的研究对象人数达到585人即可以达到样本效应量的需要。

2020年6月,课题组成员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安置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对贵州省惠水县等地十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750位搬迁妇女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750份,回收630份,回收率为84%。剔除测量结果存在缺失值大于

①曹雪梅:《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心理适应困境对策探究》,《安顺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②叶宝娟,方小婷,杨强,等:《情绪调节困难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与苦恼的链式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年第2期。

③Tsai J, Harpaz R I, Pietrzak R H & Southwick S M. "The Role of Coping, Resil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PTSD and Social Functioning in Veterans Returning from Iraq and Afghanistan", *Psychiatry-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2012, 75(2): 135-149.

④温忠麟,刘红云:《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方法及应用》,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1—93页。

⑤汪宏,窦刚,黄希庭:《大学生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的關係研究》,《心理科学》2006年第3期。

25%的问卷(42份)后,最终参与以上施测过程的样本量为588名搬迁妇女。其中,已婚妇女501人(85.2%),其他妇女87人(未婚、离异或丧偶,14.8%);使用汉语交流的妇女365人(62.1%),使用民族语言交流的妇女223人(37.9%);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妇女56人(9.5%),2000—4000元的妇女478人(81.3%),4000元以上的妇女54人(9.2%)。

### (三) 研究变量

#### 1. 领悟社会支持

采用姜乾金<sup>①</sup>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该量表采用Likert 7点计分方式,1=“极不同意”到7=“极其同意”,量表共有12个条目,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分别为0.802、0.764和0.757。

#### 2. 压力知觉

采用杨廷忠等人<sup>②</sup>修订的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该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0=“从不”到4=“总是”,量表共有14个条目,分为紧张感和失控感两个维度。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压力知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紧张感和失控感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分别为0.704、0.742。

#### 3. 生活满意度

采用熊承清和许远理<sup>③</sup>修订的中文版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该量表采用Likert 7点计分方式,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量表共有5个条目。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771。

#### 4. 社交回避及苦恼

采用汪向东等人<sup>④</sup>修订的中文版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S)。该量表采用“是-否”计分方

法,量表共有28个条目,分为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两个维度。Watson认为,社交苦恼指情感反应,而社交回避指行为倾向,他强调社交回避的反面不是社交参与而是“不回避”,社交苦恼则是针对焦虑的生理指数及受损的行为表现等。基于此,运用该量表时将社交回避及社交苦恼维度分开使用。量表社交回避维度和社交苦恼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分别为0.782和0.731。

## 三 数据处理与分析

### (一) 数据处理

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1.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差异比较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采用SPSS工具包Process 3.2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采用Bootstrap法抽样5000次检验中介效应。

### (二) 数据分析

####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8个,第一个主成分所占的载荷量为11.95%,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 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 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满意度与压力知觉、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负相关( $r = -0.468, P < 0.01$ ;  $r = -0.356, P < 0.01$ ),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r = 0.444, P < 0.01$ );压力知觉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 $r = -0.351, P < 0.01$ ),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正相关( $r = 0.485, P < 0.01$ );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负相关( $r = -0.339, P < 0.01$ )。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1 领悟社会支持	57.661	9.681	1		
2 社交回避及苦恼	14.345	6.668	-0.339 **	1	
3 压力知觉	41.105	6.515	-0.351 **	0.485 **	1
4 生活满意度	17.782	5.331	0.444 **	-0.356 **	-0.468 **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下同。

①姜乾金:《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1年第10期。

②杨廷忠,黄汉腾:《社会转型中城市居民心理压力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年第9期。

③熊承清,许远理:《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在民众中使用的信度和效度》,《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年第8期。

④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年版,第122—124页。

3. 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交回避及苦恼在压力知  
觉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生活满意度为结果变量,以搬迁妇女压力  
知觉为自变量,领悟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为  
中介变量,通过 Process3.2 构建多重中介结构方  
程模型(见图 1),并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5 000  
次对中介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

根据已有研究<sup>①</sup>,需要对各变量间关系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压力知觉能够显著负向  
影响领悟社会支持( $\beta = -0.351, S.E = 0.039,$   
 $P < 0.001$ );压力知觉能够显著影响社交回避及苦恼  
( $\beta = 0.417, S.E = 0.038, P < 0.001$ );压力知觉、领悟  
社会支持和社交回避及苦恼能够共同显著影响生  
活满意度( $\beta = -0.313, S.E = 0.040, P < 0.001$ ;  
 $\beta = 0.299, S.E = 0.037, P < 0.001$ ;  $\beta = -0.103,$   
 $S.E = 0.040, P < 0.01$ )。进一步对自变量(压力知

觉)与因变量(生活满意度)关系分析后发现,压力  
知觉能够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 $\beta = -0.468,$   
 $S.E = 0.037, P < 0.001$ )。

如图 2 所示,根据路径分析效应原理,模型的  
直接效应为自变量到因变量的路径系数,即压力知  
觉→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0.313( $S.E = 0.040,$   
 $P < 0.01$ )。此外,中介效应包含两条路径,其中路  
径 1:压力知觉→领悟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的  
中介效应为-0.105( $S.E = 0.018, P < 0.01$ );路  
径 2:压力知觉→社交回避及苦恼→生活满意度的中  
介效应为-0.043( $S.E = 0.018, P < 0.05$ )。而间接  
效应总和等于两个中介路径效应之和,即在本研  
究模型中为-0.148( $S.E = 0.024, P < 0.01$ ),且所  
有路径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跨 0 值,代  
表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2 多重中介拟合检验及路径分析

模型	R	R <sup>2</sup>	F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beta$	S.E.	bootLLCI	bootULCI
1	0.351	0.123	82.380***	领悟社会支持	压力知觉	-0.351***	0.039	-0.427	-0.275
2	0.517	0.267	106.649***	社交回避及苦恼	压力知觉	0.417***	0.038	0.340	0.491
					压力知觉	-0.313***	0.040	-0.392	-0.235
3	0.562	0.316	89.590***	生活满意度	领悟社会支持	0.299***	0.037	0.226	0.372
					社交回避及苦恼	-0.103**	0.040	-0.181	-0.024
4	0.468	0.219	164.494***	生活满意度	压力知觉	-0.468***	0.037	-0.540	-0.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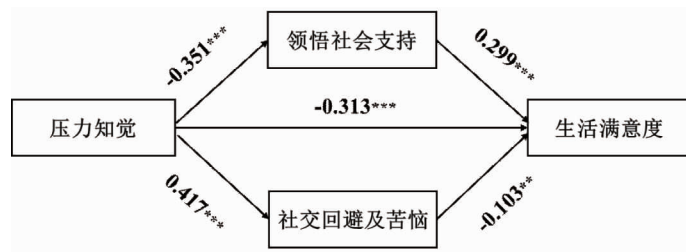


图 2 领悟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在压力知觉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表 3 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效应

路径	效应值	S.E.	Bootstrap 95% CI	
<b>直接效应</b>				
压力知觉→生活满意度	-0.313**	0.040	-0.392	-0.235
<b>间接效应</b>				
压力知觉→领悟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0.105**	0.018	-0.141	-0.072
压力知觉→社交回避及苦恼→生活满意度	-0.043*	0.018	-0.079	-0.010
间接效应总和	-0.148**	0.024	-0.202	-0.111

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扶贫搬迁妇

女压力知觉能负向影响其生活满意度,且领悟社  
会支持、社交回避以及苦恼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

①温忠麟,刘红云:《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方法及应用》,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1—93 页。



意度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首先,搬迁妇女压力知觉能负向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该结论验证了假设 H1。压力知觉不仅源于物质需要,也来自精神和心理的需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模型可知,当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个体就会趋向更高层次的归属需要。易地扶贫搬迁打破了搬迁妇女原本简单的乡邻生活模式,阻隔了惯常的人际交往。对搬迁妇女而言,社会网络空间断裂、文化心理空间弱化等重大的压力性事件会使其丧失安全感与归属感,这又进一步影响了搬迁妇女的生活满意度,个别妇女甚至可能产生回迁想法。同时,搬迁妇女在融入城镇生活过程中,对“村民变市民”的角色转变会有诸多不适,更有甚者会出现应激性回避现象<sup>①</sup>。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采取政策倾斜的方式,通过打造宜居的精神空间来增强搬迁妇女归属感。

安置社区工作人员应通过建立熟人合作体系,来帮助搬迁妇女构建社区内部互助网络系统,以降低其感知到的压力水平。在此,需要重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安置家庭在短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不敷出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还是继续遵循过去的单一物质(生活物资、补贴)发放的模式进行帮扶<sup>②</sup>,可能导致“看客”的思想在搬迁妇女群体中蔓延,甚至出现“自甘堕落”现象。因此,地方政府要积极对接《乡村振兴促进法》和《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利用扶贫政策吸引外来资金并投资设厂,帮助搬迁妇女在家门口实现“想就业、能就业、好就业、就好业”,真正拓宽搬迁妇女的收入渠道。二是要防止搬迁妇女过度依赖社区工作人员,避免陷入人际交往的“内卷化”困境<sup>③</sup>。当搬迁妇女在安置社区的社会

交往受阻时,仅仅依靠社区工作人员的帮扶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此,很有必要引进专业的社会帮扶机构,通过技能培训提升搬迁妇女的自我认知水平和自我效能感。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安置社区,需要通过开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活动,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搬迁移民进行交流与交融。

其次,领悟社会支持在搬迁妇女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即领悟来自家人、朋友等社会方面的支持,可以释放搬迁妇女感知到的压力,从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该结论证实了研究假设 H2。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应对挫折时的自信心就会越强,则更有可能体验到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sup>④</sup>。在压力情境中,领悟社会支持起着认知图式的作用,能够对行为和事件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sup>⑤</sup>。同时,个体对社会支持的知觉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sup>⑥</sup>。既往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实际社会支持的心理结构不同,即个体领悟的社会支持不一定是客观的现实支持。正是这种具有实际促进作用的心理支持,更有助于了解和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sup>⑦</sup>。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搬迁妇女囿于自身文化水平与社交能力,在感知到各类压力性事件时无法直接领悟并对接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从而难以改变在安置社区生活中的窘境<sup>⑧</sup>。因此,安置社区工作人员要结合搬迁妇女领悟社会支持的实际水平,从认知和情感上引导搬迁妇女积极对接帮扶政策<sup>⑨</sup>。随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对搬迁妇女的心智帮扶显得尤为重要。安置社区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通过建立社会爱心资源等帮扶通道,解决安置社区搬迁妇女社会支持水平偏低等问题,实现社交有群体、平日受尊重、生活更幸福的高层次社会需求<sup>⑩</sup>。同时,地方政府要

①戚晓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的女性参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周丽,黎红梅:《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③史梦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研究——基于云南移民点的调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④马文燕,高朋,黄大炜,等:《留守青少年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⑤Lakey B, Drew J. *Sourcebook of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The Germany: SpringerLink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p. 107-140.

⑥叶俊杰:《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第6期。

⑦Brisette I, Scheier M F, Carver C S. “The Role of Optimism in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during a Life Trans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1):102-116.

⑧蒋永甫:《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⑨焦璨,尹菲,沈小芳,等:《“老漂族”领悟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基于心理弹性、认知功能的中介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⑩雷石山,廖和平:《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改善农村妇女精神生活的对策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充分利用群团组织、社会企业和志愿服务组织的力量,坚持“助人自助”的原则,结合搬迁妇女知识水平和社交能力,建设一个符合安置社区的长效帮扶体系。

最后,社交回避及苦恼作为人际焦虑的分支,在易地扶贫搬迁妇女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假设 H3。社交回避及苦恼是个体在紧张、挫折或冲突等压力情境下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表现为消极回避与退缩反应。既往研究发现农村群体的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普遍较高<sup>①</sup>。迁入安置社区后,搬迁妇女滞后的生活适应能力导致其内心形成一种不利于融入新环境的防御机制,从而出现知觉歧视与社交苦恼状况<sup>②</sup>。特别是当与城镇居民交往不顺畅时,搬迁妇女习惯性地寻求原有朋友圈的帮助,以避免与外界群体交流中带来的不必要麻烦。这种方式容

易导致搬迁妇女出现社交回避的泛化,并丧失主动对接社会资源帮助的动力<sup>③</sup>。搬迁妇女的社会适应是一个逐渐改善与提升的过程,其所表现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需要社区的积极配合。在新的安置社区环境下,需要从简单的物质帮扶转变为心智帮扶。例如积极吸收搬迁妇女的有益建议,促使其充分参与到安置社区的日常管理中来,这种知情权与参与感可以进一步激发搬迁妇女的内生身份认同感。此外,安置社区需要制定具体的帮扶方案,通过开展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跨社区联谊活动,如开展“最美家庭”“最美女性”“最美楼长”等评选,鼓励搬迁妇女走出家门,激发她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引导搬迁妇女真正融入新的城镇社交圈<sup>④</sup>,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其自我认同感与生活满意度。

##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the Relocated Women's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LI Ke-sheng<sup>1,2</sup>, HAN Ying-ying<sup>1</sup> & HUANG Jiao-jiao<sup>2</sup>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2. School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Cognitive Scienc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women in som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multiple mediation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perceived stress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relocated women's life satisfact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have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have a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o control anxiety, such as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Through enhancing the policy publicity and the level of and services i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it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tress on the relocated women's life satisfac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Key words:**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relocated women; perceived stress; life satisfaction

(责任校对 唐尧)

①丁雪辰,邓欣媚,桑标,等:《青少年早期社交回避与同伴关系问题: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年第2期。

②高红星,林婉清,胡新新,等:《贫困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缺陷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效应》,《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Edward C. C., Wei-yi T., Xin Y. J., Shang W. Y. "Beyond the Role of Loneliness in Psychological Ill-being and Well-being in Females: Do Social Problem-solving Processes Still Matte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0, 155(4): 109-129.

④包先康:《区域内生发展下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的质量提升》,《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